

何謂華語語系研究？❖

史書美*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吳建亨、台大外文系博士生劉威辰合譯)

摘 要

由於西方殖民多為海洋殖民，而近代中國又多半被視為是殖民主義受壓迫的那一方，所以我們很容易忽略掉中國對內部少數民族的殖民和中國移民在東南亞殖民史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隨著中國的崛起，這些現象越來越值得我們注意。華語語系研究之所以需要被重視，主要是因為它可以在與以下三個領域對話的過程當中，揭露出中國殖民模式異於其他殖民模式的事實：首先，英語語系研究／法語語系研究容易使我們誤以為只有西方強權有能力殖民；再者，從離散的觀點看中國移民台灣和東南亞一些地方的過程容易忽略其定居殖民的性格；最後，族裔研究無法彰顯華語內部的差異。事實上，華語語系既是多語的又是多音的；因此，把所有用漢文寫成的文學作品統稱為中文文學是錯誤的。本文主張華語語系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領土以外的華語社群和文化以及中國內部那些被強迫（或是自願）學習及使用普通話的少數民族社群和文化。正因為華語語系社群的形成大多涉及大陸殖民、定居殖民和移民／遷徙這三個有時交錯或重疊的過程，我們必須要理解到每一個華語語系的實踐和表達都有屬於其特有的、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的座標。

關鍵詞：華語語系研究、華語語系文學、大陸殖民／海洋殖民、定居殖民主義、移民／遷徙

* 本文的部分內容部分取自筆者兩篇論文〈華語語系的概念〉和〈理論、亞洲和華語語系〉。前者發表於 *PMLA* 第 126 期 3 號，後者發表於 *Postcolonial Studies* 第 12 期 4 號。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與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陳漢賢伉儷基金講座教授 (shihsm@hku.hk)。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hu-mei Shih**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Western colonialism is largely oceanic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victim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t is easy for us to overlook China's internal colonization of variou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ritical role Chinese migrants played in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and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rise of China, these phenomena are more and mor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Sinophone studies attend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mode of colonization and other modes of colonization through a dialogue with at least the following three academic discourses. To begin with,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gives the false impression that only Western powers are capable of colonizing Asia. Furthermore, the casting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terms of diaspora conceals its settler colonial character. Finally, terms like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re problematic categories when it comes to literatures written in Sinitic languages. In fact, Sinophone is multilingual, polyphonic, and also poly-scriptic. I argue that Sinophone studies takes as its objects of study the Sinitic-language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outside China as well as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within China where Mandarin Chinese is adopted or imposed. It is because these linguistic communities are largely forme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continental colonialism,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im)migration that the Sinophone is not a unifying category but a heterogeneous formation calibrated by the time and place specificities of each practice and articulation..

KEYWORDS: Sinophone studies, Sinophone literature, continental/oceanic colonialisms, settler colonialism, (im)migration

* Shu-mei Shih,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t UCLA and Hon-yin and Suet-fong Chan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hihsm@hku.hk).

華語語系研究將其自身定位於眾多學術論述及學術領域的交會處；這些論述和領域要不是未曾被連結在一起，就是尚未被放置在相互滋生的關係之中，又或者是沒有被拿來相互比較。以下討論的順序沒有特別意義：我們首先要看的是以過去或現存殖民地之語言文化為對象的研究，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檢視英法兩國在亞洲、加勒比海、非洲之帝國主義遺緒的英語語系研究和法語語系研究。相對而言，在同時代與英法競逐的其他帝國（諸如美國、德國和較晚的日本）以及在此前已經達到巔峰的其他帝國（諸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較不受到後殖民研究的重視，更不用提那些不被認為是帝國的帝國了（特別是中國）。一直要到十年前左右，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才開始帶動相關的研究，他們整理文獻、分析資料，將清朝（1644-1911）理論化為內亞大陸的一個帝國，從而建立了所謂的「新清史」。他們對清朝武力征服和政治殖民鉅細靡遺的研究（尤其是對那些超越「中原」一詞所涵攝的廣袤地區譬如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中國在近兩百年的世界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詮釋；中國不再是一個受害者，而儼然是一個帝國。

這個遲來的、將中國視為帝國的看法迫使我們開始思索為何之前我們並不這樣想，此一思索又使得我們開始追問在中國史研究轉向之前，帝國的定義標準究竟為何。顯而易見地，現代帝國的諸多模型大都是歐洲的和海洋的，而清朝的擴張則是非歐洲的，且又大多發生在陸地之上。所謂「歐洲」，指的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位置，還帶有優越、理性、啟蒙的意味（歐洲似乎體現了這些價值並藉由其殖民事業將其向外傳播）。因為中國本身的發展歷程和歐洲大異其趣，清朝帝國主義的面向就順理成章地被略過了。對於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來說，歐洲的性格和海洋有相當大的關係，他甚至認為「歐洲國家之所以為歐洲，乃是基於其與海洋的關聯」（*Lectures*196）。黑格爾強調歐洲的海洋信念（maritime principle），認為這是歐洲之所以能夠成就霸業和自稱超群的手段和原因；相較之下，囿於亞洲的大陸性格，「海洋〔則〕是微不足道的」（196）。海洋信念擁抱「變化、危險和

毀滅」，正是這樣的態度，使得歐洲各國開始「發現」並建立殖民地；在這個意義上，海洋信念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基礎。因為缺乏這樣的信念，亞洲的國家並沒有動機去尋找「日常生活以外的出路」，也就無法建立殖民地，成為帝國了（Hegel, *Philosophy* 247-49）。我們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回應黑格爾的說法：首先，許多學者都強調中國具有漫長的航海史，這證明中國並沒有受限於其大陸性格；¹ 再者，中國的殖民有其特殊模式，我們或可稱其為「大陸殖民」（continental colonialism），這個概念挑戰了現代帝國主義和海洋擴張的必然連結。

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自有一套說法來解釋清朝之所以到晚年才被視為帝國的原因。他們歸咎主流派的中國史學，因為這個派別錯誤地從清末（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悲慘遭遇出發，回溯性地將整個清朝塑造成為列強壓迫下的受害者。在這個受害者敘事當中，清朝末年的積弱不振是清朝初年種下的果，所以十八世紀清朝的擴張主義是微不足道的（借用黑格爾語）。一旦清朝擴張主義隱而不揚，整個回溯性的受害者敘事就顯得更前後一致了。這個受害者敘事在革命軍起義和建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合理化了中國國族主義的訴求。即便到今天，在中國躋身世界強權的時候，受害者敘事仍然佔有重要的位置。就算有人用清朝帝國主義的面向來挑戰這個受害者敘事，漢族的國族主義者仍舊可以簡便地將所有的過錯推到滿人頭上，主張民國革命乃是為保衛漢族的國家而戰。換句話說，漢族的國族主義者可以一方面安心扮演清朝末年被列強欺侮的受害者角色，一方面拒絕承認清朝中葉的帝國主義，可以自由地遊走在泛中國國族主義和漢族國族主義這兩個立場之間。在此同時，中國已然從清朝那裏繼承了過去滿清巧取豪奪來的所有領土（除了外蒙古之外）。

¹ 請參考由 Karl Anton Sprengard 和 Roderich Ptak 所編的《海上亞洲》（*Maritime Asia*）以及由王慶武（Wang Kungwu）和吳振強（Ng Chin-Keong）所編的《轉型中的海上中國：1750-1850》（*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這兩本書都出自「南中國和海上亞洲」（*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Asi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叢書。

清朝的大陸殖民主義將「中國本土」(China proper)擴大了兩倍有餘，這個巨大的「完整領土」(territorial “integrity”)大多被後來的中華民國(1911-49)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繼承。因此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仍然享用著清朝大陸殖民主義的遺產。此一事實促使我們必須要把那些被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的被殖民者及其文化列為華語語系研究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由於中國的大陸性格的關係，那些無法獨立的內部殖民地無可避免地被有系統地整編進了民族國家的體系當中。也因為這個性格，使得中國的殖民地大多位在其疆域「內部」。這和法國殖民的型態不同：法屬殖民地大多存在於法國疆域之外，無論目前已獨立的或仍依附在法國之下的都是如此。華語語系研究的研究對象之一，就是這些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化、歷史、和社會。這些少數民族其語言的續存往往受到了強勢語言（也就是普通話）的威脅，中國政府在2009年廢除了新疆的雙語教育即是一顯著的例子。此為華語語系研究的殖民背景。

華語語系研究可以與之對話的第二個對象，是所謂離散研究裡面種種帝國語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與分布。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要強調，華語語系研究對離散研究此一框架本身的侷限是有所警覺的。想想在魁北克的法國人、在美國與澳大利亞的英國人、在美洲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人；當我們以「離散」的概念套用在這些移民之上的時候，我們往往是在美化這些帝國的國民對當地原住民系統性而大規模的暴力。這種移民的模式很明顯地屬於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而不是離散。在這個意義下，定居殖民主義即是法國、英國等等帝國的離散的黑暗面。定居殖民主義的暴力之所以常常被遺忘、被遮蔽，是因為這些移民過程發生在很久以前，使得人們誤以為要判斷這個國家到底是屬於誰的是很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所謂的「國家」其實是這些帝國離散者所製造出來的產物。這種對過去的遺忘（亦即失憶），是定居殖民者這類掌權者在社會心理層面上所下的第一層功夫。此外，定居殖民主義的暴力在上述魁北克、美國等地並未結束；定居殖民主義和內部殖民主義的相

互加乘作用使得當前民族國家的受害者從原本的原住民族擴大到了少數族裔。這種對當下的拒認（disavowal），是掌權者在社會心理層面所下的第二層功夫。失憶和拒認的運作是一體的兩面，這兩種機制正當化了彼此，使得現狀得以維持，使得定居殖民者（西班牙、盎格魯薩克遜、漢民族等等）的最高權威可以在各殖民地被保存。

中國掌權的漢人對西藏、新疆（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新的管轄區」、內蒙古和西南少數民族居住地的無間斷、大規模、背後有國家支持的大量移民或許與上述法國、英國等定居殖民主義相似，只是在中國這裡，定居兼內部殖民主義是以大陸殖民的方式達成的。這種陸上的、背後有國家支持的移民模式和離散的移民模式完全不同，這不僅僅是因為各殖民地和殖民母國毗鄰，更是因為漢族的「離散」並沒有猶太離散那樣被強迫的性質。大部分漢族移民都是受到經濟誘因的驅動才選擇定居「邊疆」的，這樣子的定居殖民在世界各地都發生過。在這些廣袤的「邊疆」地區，漢人如果不是已經成為多數族群，就是正要成為多數族群。漢族的大量移民導致了當地人的漢化，也導致了以漢人為中心的各式發展。這些移民不只大大地改變了當地的文化、語言、政治、經濟、宗教等風貌，更使得族群關係開始惡化，這些現象都可以從 2008 年的西藏暴動和 2009 年的新疆事件窺見一二。

在清朝之前，大量的漢族移民主要經由海路到達台灣和東南亞。這些漢人在新居地定居、殖民，成了列強統治下的亞洲多重殖民境況當中的一環。事實上，當明朝遺民在十七世紀航抵台灣的時候，台灣就已經是荷蘭的殖民地了。從荷據時期一直到今天，台灣的南島語系原住民總是不斷地受到可以被稱作「連續殖民主義」（serial colonialism）的大規模系統性壓迫：荷蘭人、日本人與漢人殖民者輪流接手控制殖民地，以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機動戰（暴力達成的武力征服和宰制）和陣地戰（意識形態與文化上的灌輸與控制）來壓迫被殖民者。即使原住民的自我意識和多元文化的價值觀逐漸受到重

視，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仍然需要面對酗酒、人口外移、經濟困難、文化流失等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威脅。

定居東南亞、被當地人稱為華人的漢族移民部分也可以被視為是早於歐洲殖民者的定居殖民者。東南亞，或者說中國人想像中的「南洋」，自古以來就是漢人謀生、致富的地方。庫恩（Philip Kuhn）在《他者中的中國人》（*Chinese Among Others*）此一研究當中即指出，居住於中國南方靠海的人們早在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及哥倫布抵達美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大量且持續地移居到該地；庫恩更強調，中國移民乃是構成歐美亞全球海洋貿易體系當中重要的一環。康熙 1684 年的諭令清楚地告訴我們為什麼他選擇在那個時候解除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時而實施、時而廢止的海禁——他是為了要促進海洋貿易、鼓勵與海洋貿易相關的移民活動。他不僅僅著眼於「人民生計」、「福建及廣東省的經濟繁榮」，更在乎「從商業活動當中增加稅收」（Kuhn 21）。然而，就算移民沒有得到皇帝的允許，他們仍前仆後繼地前往東南亞，從事碼頭管理、海關驗放、都市開發、稅捐稽徵、貿易仲介等工作。在歐洲殖民者前來以後，他們也開始從事西方殖民主義「不可或缺的幫手」的工作（Kuhn 12）。有時候他們相當成功，成功到他們的經濟能力要比歐洲殖民者或本地士紳來得更好。²

其實早在歐洲殖民之前，中國移民就已經開始在馬來亞和西婆羅洲擁地自重，建立自主的政權和武裝的民兵部隊（Kuhn 56）。由來自廣東的客家人在西加里曼丹建立的「蘭芳共和國」據說曾經存在超過一百年，直到被荷蘭人摧毀。這種以商人、工人和逃犯為主的移民所造成的效應幾乎就等同於定居殖民主義，至少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是如此，而華人的定居殖民主義是與歐洲殖民同時的，這點可以從中國移民人數在當時達到頂峰而得到證實。事實上，正是因為這種情況的廣泛存在及多為人知，使得晚清重要的改革家和著名的當代中國思想巨擘梁啟超在 1906

² 以庫恩所提的例子來說，在十八世紀末期以前中國移民在荷屬東印度所累積的財富就已經多到讓荷蘭人和印尼人都相形見绌了，而這最終也導致了荷蘭人的鎮壓（154）。

年說道：「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qtd. in Kuhn 246）。畢竟，南洋只不過是一座座「諸番」居住的「渺小不堪」的小島，³ 無論誰到了那裡，都應該能夠把這些小島變成「天然我族之殖民地」。這段話出自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一文，在文章中，他歌頌了八位殖民東南亞的中國蘇丹或君主。總的來說，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經驗確實與西方世界不同，就算契約勞工和苦力的確參與其中。⁴ 庫恩因此下了一個結論，他說，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看作是「中國形式的海外擴張」（12）。至於那些在歐洲殖民體系之下、中國裔的仲介者，則可以視為是某種「中間人定居殖民主義」（middlemen settler colonialism）：在他們之上是據信為擁有控制權的歐洲人，而身為中間人的他們再把權力施加在當地人身上。

因此，把「中國離散」（Chinese diaspora）一詞套用在所有情況的做法大有問題。⁵ 首先，「離散」一詞粉飾了定居殖民主義的暴力，從而讓失憶和拒認成為殖民霸權統治的標準配備。台灣和新加坡的情形一樣，一直是個漢人為主的定居殖民地，而對大部份的東南亞國家來說，除了馬來西亞獨立前的某些時期之外，華人一直是少數人口，即便他們也表現出定居殖民的現象。再者，「中國離散」這個概念仍然把台灣和東南亞的漢人與中國「故鄉」牢牢地綁在一起，即便他們已經在中國境外住了好幾個世紀。「中國離散」的概念還預設了這些人對中國文化的深深依戀，即便他們在政治上已不再效忠於中國。可是事實上，在台灣和東南亞的漢人族群並不是經常被誤譯為 Chinese 的中國人（擁有中國國籍的公民）。華裔馬來西亞人自稱「馬華」，對說福建話的他們來說，

³ 出自於藍鼎元 1724 年上呈清廷的文件，見 Kuhn 88。

⁴ 許多契約勞工和苦力其實是中國商人和管理人帶到東南亞的。至於中國移民到美國的歷史，則可參見 Ronald Takaki 的《來自別岸的陌生人：亞裔美國人史》（*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New York;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亦可參考張純如（Iris Chang）的《美國的中國人：一部敘述性歷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⁵ 更詳細的對離散的批評可以參考收錄在《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的讀本》（*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裡面的史書美和洪美恩（Ien Ang）的文章。

「中華」唸成 *Tionghoa*，而不是中文的 *Zhonghua*。⁶ 如果我們不想要把「身為中國人」等同於身為「漢人」（中國至少有 55 個官方認可的族群），也不想要把「身為華人」和身為「中國公民」混為一談（世界上各地方的華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國籍），那麼我們就必須要更小心、更精確地使用中國人或是 *the Chinese* 一詞，也必須要了解華人或是華語語系使用者的各種樣態，無論他們身處台灣、馬來西亞還是其他地方。

華語語系研究可以對話的第三個對象是族裔研究或是弱勢族群研究。無論漢人在幾世紀以來遷徙到哪裡（作為苦力、契約勞工、商人、學生、移民、或是版圖橫跨多國的資本家），成為被族裔化或種族化的華裔少數族群，他們對中國各種語言（早期主要是潮州話、福建話、和廣東話，現在則是普通話較為普遍）和文化的保存與混雜構成了華語語系研究一個特殊的面向——研究中國以外世界各地華語圈的文化。在諸如美國、英國、德國、澳洲、加拿大等地，隨著早期移民在幾個世代以後越來越徹底的在地化，以及新移民源源不斷地給華語語系的文化生產添枝加葉，華語語系各種文化的興盛或衰落可說是歷歷在目。⁷ 而東南亞各國的獨立則使得華人失勢，他們的文化和政治勢力遠遠不如他們的經濟勢力，他們為國家厲行的種族中心主義所壓迫。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華語語系文化並非僅僅是華人製造出來的文化，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因為有許多族群參與其中，所以華語語系並非是以族群來界定，而是以語言來界定，即便有時候這兩者所界定出來的結果是相同的。隨著中國的崛起，一個「官方版本的華語語系」（*official version of the sinophone*）定義的出現是可以預見的，在這個可能的官方版本中，中國官方定義的普通話——即漢人的語言「漢語」——就會擁有絕對價值。⁸ 但是從位置、定義、產出和散播的角度來看，各個華語語系文化

⁶ 感謝莊華興先生 (Chong FahHing) 向筆者詳細地解釋了這些詞在馬來西亞使用上的差異。

⁷ 讀者可以參考史書美在《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的讀本》裡面的文章來了解華語語系消失的現象。

⁸ 做為把漢語推廣到世界各地的國家組織，挾著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漢辦」已經用「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 佔領了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大學。漢辦的英語全名是 Offi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

和社群所面對的難題和挑戰是如此地多重，以致於當談到任何一個文化實踐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要將其獨立出來，唯有把這個文化實踐置於其所屬的時空背景和情境當中來考察，我們才能理解其實在的意義。

我們在此強調華語語系研究和族裔研究兩者之間的共鳴，至少具有兩個意義。首先，華語語系文化「非離散」和「地方性」的特質因此得到突顯；華語語系文化成了所屬民族國家多元文化主義和多語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舉例來說，美國的華語語系文化是美國文化，而在美國所使用的各種華語也應該被視為是美國的少數語言。再者，即便華裔族群對神話中的或是真實世界中的中國具有深刻的思鄉之情，華語語系文化仍然是在地的，是屬於其所產生之處的。美國華語語系文化當中對中國的思鄉之情出自於移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所以是一種美國的思鄉之情。華語語系文化是一種跨國的現象，因為我們在世界的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其具體的表現和實踐在各個地方都大不相同。所以，從構成的層面來看，華語語系文化是跨國的，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華語語系文化卻是在地的。

一、華語語系的多語主義

近幾年，當學者使用華語語系一詞的時候，多從其字面上的意思，用來指涉「說中文的」或是「以中文寫就的」。黃秀玲以其來指涉以中文而非英文寫就的華裔美國文學(48-49)；⁹ 清史家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和李普曼(Jonathan Lipman)把「使用中文溝通」的穆斯林稱為說漢語的穆斯林(也叫做回人)，藉此跟說土耳其語的維吾爾穆斯林做區別；¹⁰ Patricia Schiaffini(94)和Lara Maconi則區分以藏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和以華語寫作的藏族作家。

⁹ 讀者亦可參見黃秀玲在《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的讀本》裡面的文章。

¹⁰ 參見柯嬌燕、羅友枝、和李普曼的論述，特別是李普曼在《位於邊緣的帝國：近代中國的文化、種族、和邊境》(*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5)中的論文，頁86。

雖然在這些人的用法當中，華語語系一詞起了標示的作用，但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則是要以命名的動作來做對比和區分：黃秀玲旨在揭露學界以英語本位定義美國文學的偏見，並呈現出美國文學多語的面向；柯嬌燕等人則強調中國的穆斯林民族中，語言、歷史與經驗的分歧性；Shiaffini 和 Maconi 則指出藏族作家使用漢語，也就是「殖民者語言」時，所遭遇到的書寫困境與身分認同和語言差異之間的糾葛（Shiaffini 89）。筆者先前使用華語語系這個詞的時候，心裡是想著馬華文學和印華文學的，希望這個詞能夠突顯出區分做為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華語語系文學和做為多數文學（major literature）的中國文學的必要。筆者試圖用華語語系一詞取代令人混淆的「中文文學」一詞，重新賦予那些文本一個新名字，因為「中文文學」（literature in Chinese，在中國領土以外生產的文學）是與「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在中國領土以內生產的文學）相互比較之下所誕生。英語 literature in Chinese 和 Chinese literature 這兩個詞裡面 Chinese 的涵義太過含糊、太容易讓人以為是同樣的東西，使得批判工作的進行受到了阻礙。¹¹ 筆者當時的理論模型是大家所知的馬華文學——所謂馬華文學，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華人所書寫的或者是以華語或華文書寫的馬來西亞文學。雖然馬華文學屬於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部份，但是它無論在馬來西亞還是在其他地方都逃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之所以是少數文學，並不是因為它是以多數語言寫就的小文學〔像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所說的那樣〕，而是因為它是以馬來西亞這個民族國家當中的少數語言所寫出來的小文學，是努力地想要在以馬來語單一語言為主的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當中做出異於主流語言和主流文化表達的小文學。

以上華語語系一詞字面上各個意義的匯合，指示給我們它在不同的地方所代表的不同意義，讓我們得以將華語語系視為相互關聯但又有所

¹¹ 參見史書美在《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的讀本》裡面〈反對離散〉（“Against Diaspora”）一文（25-42）。

差別的種種歷史過程匯聚而成的產物，這些歷史過程包含了不同殖民形式的形成（大陸的、內部的、定居者的），包含了華人的遷徙活動，也包含了各種華語自然或是強制的散播。這些歷史過程製造出了各種位於中國邊緣的弱勢和少數文化，而所謂的邊緣，既可指涉中國政治地理疆域以內的邊緣地帶，亦可指涉那些位於中國政治地理疆域以外的世界各地區。各種華語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流通；在這些角落，具有地方色彩、和當地其他文化互動而成的華語語系文化也應運而生。因此，我們必須從不同的學科來看待這種多元在地（multi-local）的華語語系文化——例如文學、電影、人類學和歷史。於是，華語語系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

「華語語系」和此前常用的形容詞「說中文的」（Chinese-speaking）兩者最主要的一個差別就在於華語語系不是單音的，而是多音的（polyphonic），就好像所謂的華語事實上包括許多語言一樣。這些聲調各異的華語被認為屬於漢藏語系。漢藏語系是世界各語系當中最龐大的語系之一，漢藏語系的「藏」指的是四百多種的「藏緬」語，這些語言流通的地區包括中國、西藏、南亞、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漢藏語系的「漢」指的則是各種漢語。根據梅爾（Victor Mair）的說法，這些被認為是中國方言的語言嚴格來說其實是不同的語言（7）。在這種觀點之下，所謂的華語社群，應該指的是說普通話／國語、廣東話、福建話、客語、潮州語等等語言的社群的總合。因此，華語語系研究要處理的語言種類繁多，這也連帶使得華語語系文學本身成為了一個多語的文學。華語語系社群很難是單語或是獨語的，這種多元的特質又是華語和當地語言互動、混合的結果。舉例來說，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作家在寫作的時候經常用到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而普通話、福建話和廣東話等華語的使用就更不用說了。在這個意義之下，Sinophone literature 一詞應該要翻譯成華語語系文學，而不是華語文學或是華文文學（標準中文寫成的文學），以強調這個語系當中存在多種語言的事實。

標準語言的確立是國家形成的過程當中無可避免會出現的現象，就好像是過去中國民國時代的「國語」或是當代中國的「普通話」。同樣地，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後，馬來西亞政府推行的國語是馬來語，而非英語、中文或泰米爾語。這告訴我們，雖然許多國家都主張自己的國語是境內唯一通用的語言，但是世界各地的語言分佈事實上要更複雜一些。舉例來說，十九世紀移民美國的漢人最主要所使用的語言是廣東話，他們不叫自己中國人，而是叫自己唐人。他們變成所謂的「中國人」或是「中國佬」，是在他們抵達美國、被懷有敵意的美國人種族化之後的事。華裔馬來西亞人主要使用的語言是充滿當地韻味、經過混雜而成的潮州話、福建話和廣東話，他們自稱為華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稱普通話為華語（華人的語言），而不是漢語（漢人的語言）。台灣最常使用的華語是閩南話，華裔韓國人說山東話，對華裔義大利人來說，則是溫州話。因為華語包含了大約四十幾種語言，而彼此之間的差異又是如此地大，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往往無法理解對方在說什麼，更不用說如果他們用來溝通的是在中國以外各地經過混合、或是正在與當地其他語言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混合語了。畢竟，語言是活的。所以，華語語系是多音和多語的。

把華語口語騰成文字的時候最常使用的是標準的書寫系統，這個書寫系統是所有華語語系社群所通用的。這個情形和阿拉伯語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管兩個說阿拉伯話的人到底能不能以口語溝通，他們都共用阿拉伯語的字母。廣東話、台灣話、福建話和其他的華語社群和阿拉伯語社群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這些社群常常會創造出標準書寫系統裡面沒有的文字。為了把各式各樣的華語騰寫成文字，新的字不斷地被創造，就算是標準的中文書寫系統，也免不了要受到當地其他語言的影響。舉例來說，在華語語系台灣文學當中常常可以看到用來表示閩南、客家、原住民語言的新字。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學當中亦不乏馬來語、英語和泰米爾語的文字和表達方式，這種語言混合的現象威脅了作家李永平等人所珍視的「純粹」中文。法語句法和慣用語則是不知不覺地滲透到了華

語語系法國文學之中。在中國境內，我們也可以看到以華語所寫成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是如何地受到了藏語、蒙古語、泰語或阿拉伯語的深刻影響，許多詞被音譯或翻譯成普通話，大大地殊異化了中文的書寫系統。各地華語語系社群的發音和書寫都不太相同，這個情形一方面戳破了漢族中心主義的神話，讓不同的族群和語言都能夠得到重視，一方面凸顯出了所謂標準語或國語的專橫。華語語系因此不僅僅是多音的，其書寫系統也是多樣的。

我們可以借用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對民族主義的分析來思考國語政策所帶來的單一語言假象以及該制度所隱含的三個矛盾：首先，語言政策應該符合現代生活需要，但政府卻轉向過去，藉由建立一古老的系譜來自我正當化，在這個意義上，國語制度是過時的。再者，語言被認為是普世的，但是其具體表現卻是特殊的。最後，國語制度具有政治效力，但其背後的哲學卻是貧瘠且缺乏條理（5）。簡單地說，國語政策下的單一語言制度在哲學上毫無說服力，它的宿命論觀點拒斥現在與未來可能存在的語言多樣性與豐富性。相較於制度上的僵化，語言社群是開放且不斷變化的社群，成員的組成波動不定，社群裡使用的各種語言也會變形甚或消失，而且在實際使用各種語言的過程當中，每個語言本身也會產生變異。法國哲學家巴里巴（Etienne Balibar）提出了對華語語系研究相當重要的觀點，他認為「語言社群是**存在於當下的**社群（*community in the present*），這個社群給人一種永恆存在的感覺，卻沒有訂下某種宿命，強迫後來的世代來依循」。語言社群還具有『奇特的可塑性』（*strange plasticity*），能夠把許多語言挪為己用，能夠把自己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論述載體，以及語言變化本身的載體」（98-99）。華語語系研究預設的前提是華語的可塑性，沒有預設的宿命，我們甚至不排除華語語系研究有一天會因為華語的消失而自己走到盡頭。因此我們也必須要體認到這樣的一個事實，華語語系的各種文化可能會興盛，也可能會消逝，這是自然的現象，不需要為之歡欣或是沮喪。或許我們

唯一需要知道的，是華語語系文化／社群的存在，因為存在，所以值得被研究，如此而已。

二、歷史過程

總結一下，華語語系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領土之外的華語社群和文化以及中國內部那些被強迫（或是自願）學習及使用普通話的少數民族社群和文化」。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這些語言社群的形成大多涉及了三個有時交錯或重疊的歷史過程：大陸殖民、定居殖民和移民／遷徙（[im]migration）。以下分別說明：

（一）大陸殖民

和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藉由海上武力建立的殖民強權不同，中國乃是藉由陸上武力建立領土內部的殖民地和疆界以外的殖民地。蒙古、西藏和新疆（北半部之前稱為準噶爾，南半部稱為塔里木盆地）是清朝在十八世紀藉由一系列的殖民戰爭和廣泛且完善的殖民統治所強占的領土。最近的清史研究因為著眼於帝國內部的族群關係而被稱為「中國研究的族裔轉向」（the ethnic turn in Chinese Studies）。華語語系研究參與了這個族裔轉向的研究趨勢，因為我們特別想要知道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是怎麼看待華語（尤其是標準華語／漢語）文化的。蒙古人、滿人、藏人和許多其他中國境內的民族都會說多種語言。不論是自願學習或外在強加，就他們能以漢語交談和書寫而言，這些少數民族即是華語語系社群的一份子。在西南邊界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是多元語系社群，他們藉由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或接受漢族的同化。

最接近這些中國內部少數華語語系社群狀況的，要算是喬治亞、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等後蘇維埃俄語語系國家了。這些國家在沙皇時代和蘇維埃時代經歷過了大陸殖民主義，經歷了社會主義式的、特殊的多元

文化主義的興衰。然而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因為殖民還未成為過去，所以他們文化和政治目的仍然著眼在反殖民或去殖民，這和美國境內的原住民族群的情況類似。在這個意義下，台灣的華語語系原住民文學或許和華語語系西藏文學或維吾爾文學較為接近。當我們在分析這些從所謂「邊疆」地帶而來的華語語系文化材料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要先分析其背後存在的大陸殖民狀態的特質，都必須要注意到所謂的「邊疆」，其實是從漢族的角度出發觀看世界的產物，是古老的「中原中心主義」在作祟。很多少數民族的作家是如何辛苦地在各種語言和文化當中折衝，才能以漢人的主要語言（也就是漢語）寫作。這些作品符合德勒茲和瓜達里所說的「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因為它們是以多數語言所寫就的小文學，它具有政治性，而且還常常呈現集體的價值（16）。

（二）定居殖民主義

定居殖民主義此一類別適用於外來的定居者持續掌握著機構上、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主要權力的國家。今天漢族移民大量湧入新疆和西藏，導致當地的人口分佈朝向漢族傾斜，可以被視為是和大陸殖民主義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定居殖民主義。中國來的移民從十七世紀開始陸續抵達台灣，對當地的南島民族展開殖民；在這之前是荷蘭的殖民，在這之後是日本的殖民，最後則是二次大戰之後從中國播遷來台的新政權。在台灣的漢人說普通話、客語和河洛語，而原住民則是說各式各樣的南島語和殖民者的語言（也就是漢語）。這是一種多層次的殖民體系，但台灣漢人對原住民的壓迫卻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目前，台灣在國際社會不斷地被邊緣化，中國的崛起又帶來了新的挑戰，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個新殖民關係的開始。在某些意義上，先是被法國殖民後來又被英國帝國主義宰制的魁北克歷史和台灣的連續、多層次的殖民狀態相似兩者都受制於定居殖民主義的影響，也受制於定居殖民主義以外的另外一層權力架構的支配。因為身為定居殖民地的台灣是華語語系文學的重

鎮，所以除了研究所謂漢人的多語的華語語系文學（國語、閩南語、客家話等）之外，我們也必須著重於研究原住民文學中語言之間混融的現象所揭露出來的殖民關係。

許多從中國來的、說不同種類華語的漢族移民定居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的馬來亞；正如同前面提到的，他們擁有巨大的經濟和文化力量，無論是在英國殖民者來到之前還是之後。在華語語系的馬來西亞文學當中（特別是在受到關注的、於台灣創作的張貴興所寫的雨林三部曲當中），我們看到了對漢人定居殖民者種種剝削土地、欺負人民的作為的強力批判。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後，新加坡最終也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一個政治和經濟大權都由華人掌握的現代國家，但是華語語系文化並不是主流的文化。這或許是一個歷史的反諷：相較於從殖民時期到現在從無間斷且充滿活力的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學創作，新加坡的華語語系創作似乎已經不需要某種迫切感。雖然新加坡的公民都享有說「母語」的權利，但是後殖民時代新加坡政府的英語政策已經讓新加坡文學成為主要以英語寫作的文學，華語反倒不是作家發聲的首選語言了。因此，新加坡的華語語系文學總是要跟英語語系文學放在一起檢視，一方面觀察官方的多語政策，一方面觀察該城邦的國際化脈動。

（三）移民／遷徙

中國的移民、遷徙和移居已經進行了數世紀之久，新的和舊的華語語系社群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庫恩的《他者中的中國人》鉅細靡遺地記錄了這個過程。這個歷史過程不僅僅影響了那些有大量華人移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約占了人口的 26%），也影響了像美國那樣具有一定數目華人移民的國家。在美國那樣的接待國當中，中國移民通常不佔據任何主要的權力位置，因此不能說是中國定居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但是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華裔的馬來西亞公民和菲律賓公民擁有可觀的經濟力量——即便不是政治力量。當我們在研究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化和華

語語系菲律賓文化的時候，這些相對的權力狀態都必須要詳細地定位出來。他們的華語語系文學是以少數語言所寫成的小文學，因此不是德勒茲式的「少數文學」；德勒茲式的少數文學體現在台灣的華語語系原住民創作當中，是一種以多數語言寫成的小文學。

這三個歷史過程可以重疊，可以交錯，我們在這裡所做的區分是有其助益的，但這個區分並非絕對。總地來說，我們在這裡所描繪出來的華語語系研究的輪廓是一個歷史的、以地方為主的輪廓，這顯示了華語語系本身並非一個統一的範疇，而是一個異質的構成，每一個實踐和表達都有屬於其特有的、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的座標。

引用書目

中文

黃秀玲。〈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中外文學》
34.4 (2005): 15-53。

英文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rint.
- Balibar, Etienne.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1991. 86-106. Print.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Print.
- 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Print.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T.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0. Print.
- . *The Philosophy of Rights*. Trans. T. M. Knox. Oxford: Oxford UP, 1967. Print.
-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Print.
- Maconi, Lara. "Lion of the Snowy Mountains: The Tibetan Poet Yi Dam Tshering and His Chinese Poetry: Re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Ed. Christian Klieger. London: Brill, 2002. 165-94. Print.
- Mair, Victo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tonic Papers* 29 (1991): 1-31. Print.
- Shiaffini, Patricia. "The Language Divide: Identity and Literary Choices in Modern Tib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7.2 (2004): 81-98. Print.

